



晚明文人

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

感动于这相隔三百多年奇妙的时空对接，
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是如此的相近

曾婷婷 著



生活美学

晚明文人

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

曾婷婷 著

感动于这相隔三百多年奇妙的时空对接，

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是如此的相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曾婷婷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7 -5668 -2180 -5

I. ①晚… II. ①曾… III. ①知识分子—生活—美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834.3②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8720 号

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

WANMING WENREN RICHANG SHENGHUO MEIXUE GUANNIAN YANJIU

著 者: 曾婷婷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李 艺

责任编辑: 李 艺 吴瑜玲

责任校对: 邓丽藤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4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4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晚明小品文中的江南城市意象研究”阶段性成果

序一 借鉴生活美学遗产，让生活更加精致、优雅

阮国华^①

生活美学是什么？20 世纪在世界性的战乱之后，哲学家们开始在生活的审美中寻求心灵的安放。卢卡奇提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海德格尔提出人当“诗意地栖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和艺术逐渐向“审美泛化”演进。于是，有关生活美学的学术探讨和实践便呈现日益繁荣的态势。其实，生活美学古已有之。在中国，生活美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史。先秦时期，尽管儒家的政治化、伦理化的美学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早期儒家经典中也开始呈现出生活美学元素。如孔子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关于“以文会友”（《论语·颜渊》），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等的观点都涉及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的问题。尽管他十分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但最终不忘“游于艺”（《论语·述而》）。也就是说，他既强调作为社会的人的政治、伦理操守，也希望作为个体的人有一个相对自由的艺术化的生活境界。在《论语·东鲁春风吾与点》中，孔子既肯定冉有、公西华的治国之志，又表现了对曾点提出的在大自然中诗化的生命畅情的肯定和向往。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以社会责任、良知为前提的生活美学的良好先声！

同样，早期道家经典也明显包含生活美学的内涵。终南山上作宇宙玄想的老子在建构哲学大道、提出治国方案的同时，也在开启生活美学的思考。他提出的理想社会便包含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① 阮国华，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广东古代文论研究会会长，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

(《老子·八十章》)的生活审美化的内涵。他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知其黑”(《老子·二十八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等观点实际上为包括生活美学在内的一切审美活动提供了法则。《老子·十一章》更是一篇直接论述造车、制陶、房屋建筑的生活美学专论。而他多次强调的“能婴儿乎”(《老子·十章》)、“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的观点实际上是后世“童心说”的先声，其中包含的求真、重视自然人性的思想元素成了后世生活美学观念的重要理论前提。

作为“美的哲思”的《庄子》在更广阔的美学背景下为中国生活美学提供了思想营养。首先，其“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论将人的审美活动与天地万物、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他反复申述“万物复情”(《天地》)、“与物为春”(《德充符》)、“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也就是说，人的审美境界最终是“万物与我为一”的“物化”境界(《齐物论》)。这实际上为一切生活美学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他注意到当时生活实践和手工制作中美的创造内涵并揭示了其法则。他认为“能有所艺者，技也”(《天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养生主》)。他通过对“痾偻承蜩”“津人操舟”“梓庆削木为鐻”(《达生》)、“轮扁斫轮”(《天道》)、“庖丁解牛”(《养生主》)等一系列精湛技艺的生动描述和赞美，说明在充分了解对象、深入掌握有关规律后，专心致志，才能得心应手，进入美的创造的自由境界。庄子所向往的审美创造又是以其“天放”的自然人性美作前提，强调驰骋人的自然天性，率性而为，自由挥洒，做“不逆寡，不雄威，不谟士”的“真人”，或“畸于天而眸于人”的“畸人”(见《大宗师》《马蹄》)。这就为后世如魏晋、晚明那些持傲世、愤世或出世姿态的生活美学积极营造者提供了理想化的人性典范和人格模式。而以“心斋”等命题阐发的“虚静”说(见《人间世》《庚桑楚》等)，又为后世生活美学中优雅的、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从心理状态上提出了要求。尽管庄子的美学思想十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但是在人的现实审美活动中，他并没有完全排除其社会内涵：“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地》)，亦即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既要开放自然，自由驰骋，也应有社会伦理担当，比之后世某些极端化的生活美学观念，庄子似乎更通达一些。

当然，虽然早期儒、道代表人物的生活美学观念还只是初萌的、大化式的，但是这种对生活美学的重视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生活美学大踏步发展的两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它们与两个大的思想解放思潮相伴而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期。面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现实，面对儒学衰败、纲常倾颓的思想环境，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精神依托。佛教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所形成的玄学成了笼罩社会的思潮，“中朝贵玄，江左称盛”（《文心雕龙·时序》）。在玄学的思辨中，人们开始突破被儒家神化的伦理纲常，开始关注人生的意义，留意生与死的终极思考。面对长久的血雨腥风，重人、重生思想开始抬头。“性不信天命之事”的曹操便明确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秋胡行（其二）》），在我国思想史上率先把人放在了至高的地位。与此同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也成了士人们反对名教、摆脱思想束缚的思想武器，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正是这类观点的突出代表。于是，退隐山林、回归田园便成了士人崇尚的人生去向。此外，作为对名教和乱世的消极对抗形式，享乐主义思潮也开始抬头，晋代出现的《列子·杨朱篇》便对其进行了理论概括：“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晋士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名教，超出仕途，开始了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注，从而迎来了我国生活美学的第一个高潮期。

首先，人们开始了对外形美、风姿美的关注，对服饰、容貌、神态的自觉的审美讲求，即“美姿容”。《世说新语·容止篇》几乎就是这方面的专论，其对人的身材、肤色、鬓发、眼眸、神情一一进行了审美品评，并以诗意描绘的形式提出了美学风范，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其次，人们开始注意生活中人的内在个性气质的差异性，并进行美学认知。刘劭的《人物志》便从九个方面（“九征”）来对人进行品评：“神者，质之主；精者，实之本；筋者，势之用；骨者，植之基；气者，决之地；色者，情之候；仪者，形之表；容者，动之符；言者，心之状”，并

以“才性”为中心按才能和性格将人分为“十二流业”和“十二类型”。这种立体、多侧面观人的人才论延伸到审美活动中便突现了对人的气质个性的审美认知。曹丕的“文气说”强调“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强调作家的气质个性对写作的重要作用；谢赫标举的“气韵说”（见《古画品录》）、刘勰倡导的“风骨说”（见《文心雕龙·风骨》）都是将对气质个性的注重伸展为特定的审美范畴，从而促进了审美活动的人格化、生活化。

在玄学和隐逸之风的推动下，山水怡情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自然风物成为突出的审美对象，人们更加注意营造和享受山川田园之美。这也促进了生活美学的发展。那时，人们对自然的自觉鉴赏常常是“流连信宿，不觉忘返”[袁崧（一作袁山松）《宜都记》]；常常是“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晋书·孙统传》）。阮籍“登临山水，终日忘旧”（《世说新语·任诞》）；嵇康把“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钓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赠秀才入军十四》）当作人生要义；王羲之更是带领文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地群游玄聚……不但游赏，而且按审美要求主动建造人间乐境：“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市，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仲长统《乐志论》）于是在文学领域，“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时序》），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卓现文苑；在建筑领域，随着石崇式大庄园和陶渊明式田园居的营造，园林营造的审美观照纷纷见诸笔端，石崇《金谷诗序》、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正是其中突出代表。对自然美的流连鉴赏，推动了生活美学的一大分支——旅游美学的发展。除了众多的玄言诗、山水诗、游仙诗、游记、诗序、画论中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北魏郦道元长达三十万言的《水经注》更是成为中国第一部大型山水文集，在其记叙、描绘和抒情评议中包含着审美鉴赏的内涵，应看作最早的大型旅游美学成果。

最后，与该时期狂、怪、痴、忤的人格取向，乱世的悲怆，生死的感伤及享乐主义相联系，生活中的酒文化有了更深广的内涵，而游宴之风和玄谈之风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我们既可以看到阮籍、刘伶、阮咸等人的纵酒狂肆，也可以看到刘惔《酒箴》、戴逵《酒赞》、刘潜《谢晋安王

赐宜城酒启》、高允《酒训》等叙酒、论酒文字；我们既可以看到陆纳、桓温和齐武帝等人主张以茶代酒、以茶养廉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左思成为第一个将茶文化入诗的人，写了《娇女诗》，还可以看到陶弘景是如何爱茶、重茶（见其《杂录》）。它们都渗入了我们早期的茶酒美学内涵。

魏晋时期最负盛名的竹林隐逸、金谷炫富、兰亭雅集、归去南山等经典的人文情景和文化事件，既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士人的人格取向，也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第一次大的飞跃。其生活美学成果在阮籍《乐论》，嵇康《琴赋》《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刘义庆《世说新语》以及众多相关的山水田园诗文中都得到了体现。当然，为这一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和士人的思想依归所限，其生活美学的层次和系统性尚有明显局限。通过唐、宋、元以及明前期的积累，中国生活美学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终于迎来了又一个高峰，而这正是曾婷婷此书所要总结、探讨的内容。

作者在正面立论之前，首先对学术界关于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的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成果作了较全面的评介，并对能体现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的有关专著和散见资料从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饮食、起居、礼仪、旅游、习俗等方面作了认真、细致的搜集和梳理。这不仅使主体论述的展开有了较厚实的学术基础，也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和借鉴晚明生活美学成果提供了文本资料和线索。

有关晚明生活美学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作者颇具见地地从中拈出了“欲”“闲”“癖”“奇”“生”等观念，以之为纲，联系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人的生活状况，将其生活审美实践与生活美学观念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从而勾勒出了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基本风貌，并揭示了诸核心观念各自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显示了作者独有的学术视角。

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观念包含着对心学成果的积极发扬和运用，对感性个体生活的充分肯定，以及化人生困境为审美情境的生活智慧。这对挣脱程朱理学束缚、反对伪道学、提高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同时也夹杂着非理性的“欲”的沉溺和颓废情绪。曾婷婷在对上述五个审美观念进行论述时，既注意从其历史延伸和在晚明的现实内涵中剥离其社会局限和思想局限，又着意于理清其可为当今生活美学所借鉴的有益成果：如

“欲”中对“体舒神怡”“美食美居”的讲求；“闲”中关于“趣”的探讨以及通过种种“长物”实现生活审美的广泛化；“癖”中所包含的“真”及“审美感官精致化”；“奇”中所包含的凸显个人风格和独创精神（“贵活变”）以及对时尚的关注；“生”中所包含的“尊生”“养生”“养神”“养心”内涵……在各章的论述中，作者还注意列引、分析这一时期高濂《遵生八笺》、袁宏道《瓶史》、屠隆《考槃余事》、文震亨《长物志》、计成《园冶》、李渔《闲情偶寄》、陈继儒《岩栖幽事》、顾元庆《茶谱》、张岱《陶庵梦忆》等多个有关代表人物和代表生活美学论著的个案，让读者感到可学、可用，便于借鉴。总之，作者运用流畅的论述语言，通过对有独创性的范畴的提炼和剖析，以清晰的论述层次为我们提供了易于把握、便于借鉴的晚明生活美学总结。

回顾我国的社会发展史和美学发展史，生活美学被一个波次又一个波次地推向新的高峰，其原创能力是如此令人震撼！其丰富的实践内涵和理论成果使之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巅峰绝对当之无愧！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类生活更美好。未来二三十年将是应用科技大发展的时代。我认为生活美学也应与之相向而行，交融共进，将生活的现代化和审美化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文化消费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生活美学的发展和研究应该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应为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新生活添花加彩！我们祝贺曾婷婷博士这部著作问世，它显示了作者较扎实的专业功力和较强的学术识见；我们也期待着学术界和曾博士本人新的生活美学著作的诞生！

2017年5月20日于广州童心斋

序二 晚明美学的中国韵致与当代意义

吴予敏^①

在一种糅杂着繁荣与颓败、开放与压抑、新创与沉滞的复调式的精神氛围中，阅读曾婷婷博士的著作《晚明文人士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会不由自主地为之吸引、为之兴奋、为之感慨。

几年前曾婷婷随我攻读中山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学术上有相当准备的年轻人。这要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良好的教育训练，特别是罗筠筠教授的悉心栽培。客观地说，我对婷婷所付出的指导功夫是不足挂齿的。

从生命的直观体验、知识兴趣出发选择一个探究的对象，将当下的社会经验和观感融汇于研究对象，即便是天外谈玄或梦中求道，也充满了思想热力的蒸腾和坚实的价值实感。这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同意她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数年后她经过反复修改打磨，完成了这部较为成熟的书稿，我依旧十分高兴当初师徒二人的默契并未错置。

中国美学思想研究是一个成果丰硕、充满挑战的领域，但也是深受西方美学话语风格浸润的。西方的美学体系基本上依存于哲学殿堂，是哲学体系（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逻辑派生物。这和中国美学的秉性品格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美学的生命诞生于历史上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艺术生活，而这两者又天然地寄存在生趣盎然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方美学崇尚体系化建构，因此，美学范畴是结成美学体系的纲领。研究美学史，必是以范畴梳理讨论为要务。如果用这种方法处理中国美学，往往会发生牵强附会、顾此失彼的尴尬。学术界常常关注中西方学术的对话会通，就需要

^① 吴予敏，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

找到双方都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于是中国美学的意义似乎只能通过西方美学话语的诠释才能彰显。20年前我在关于传统文论的语义诠释的一篇论文中,借助语义学的方法,从符号与义位、多重联想意义、独特的涵指方式、文本语境构成四个方面,尝试对传统文论和美学范畴进行语义分析,目的是探讨中西方美学范畴的语义层面的根本差异。而曾婷婷在这本著作中所采取的方法,则是观念史的研究。她不是从范畴的语义层面,而是从生动活现的审美经验层面来提炼和辨析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

美学观念的研究,广义上说也是思想史的一种类型。豪舍尔在给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对观念史作这样的概括:“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由此可见,范畴史的研究和观念史的研究各有其不同的侧重。范畴史研究比较注重理论性或专业性的文本,并以理论概念的词语作为分析基元;而观念史研究则要以更加广泛的材料作为支撑,场景、物件、形象、概念、抒情、事件、行为都可能成为观念分析的基元。这对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什么材料才可以作为适当的观念史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和阐释如何聚焦于核心的或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或者说,如何从分散的材料当中提炼出一个时代的核心观念?这是对研究者的文献功夫、洞察力和理论概括力的考验。

曾婷婷的这部著作,给她自己提出了挑战。她选择了晚明这个人心浮动的特定的时代,选择了一批政治失意而放浪形骸的才子文人的日常生活,选择了内容驳杂风格各异的小品文作为基本文本,试图从中把握从日常生活行为到精神生活一以贯之的审美观念。

近百年来关于晚明小品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折射到现代文学和美学思想史。“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晚明小品文一度作为性灵解放先驱的文字得到新式文人们的垂青。鲁迅曾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小品文的危机》)这话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那个“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氛围里说的,他从“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看出晚明

小品文里的“光彩和锋铓”。这种具有强烈社会改造使命感和抗争意识的评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晚明小品文乃至所有文学价值的主要尺度。当人们逐渐走出那个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其阅读文学的视角和价值尺度也会有所丰富和调整。晚明小品文所体现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多面性乃至矛盾性便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呈现出来。

晚明美学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不仅在面貌和本质上区别于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主流文化，也有别于以道家思想为依归的审美精神。就前者而言可一目了然，而后者则尚需辨析。晚明美学的世俗性、物质性、身体性、感官化、娱乐化、都市化，是区别于以往美学观念的重要特征，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明清小说、戏剧和工艺创造的辉煌成就，开启近代艺术和思想解放的先河。小品文的品类虽小，其所折射的思想流变的取向却耐人寻味。回到我们今天矛盾交织的时代，重新阅读晚明小品文，透过张岱、袁中道们的充满性灵和梦呓的文字，去体会繁华旧梦的日常生活，也犹如通过历史透镜折射出中国人的审美兴味和精治理趣。

曾婷婷在晚明小品文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欲”“闲”“癖”“奇”“生”五大美学观念，既是对晚明文人群体的社会生存方式和思想类型的全面解读，更是对晚明美学独创性价值的深入发掘。她以五大观念为框架勾连起丰富的文本资料，旁征博引，读来并无隔涩胶柱之感，倒是觉得立论坚实可靠，有血有肉。在美学著作中，人物和观念鲜活地呈现、交相辉映的写法是不多见的。当然，给我更多启示的是这项研究通过中国美学的经验向西方美学的一些既定法则提出的补充和挑战。例如，“欲”可以成为一个美学观念吗？柏拉图主义界定了审美观照的反欲望模式，灵肉二元论的观念一直贯穿在西方美学的传统中，直到现代主义出现，西方美学才正视由欲望和身体所唤起的审美经验。曾婷婷在晚明小品文里面发掘出“欲”的内在审美价值，她认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之“欲”是建立在生命快感基础之上的，但又不仅仅满足于感官享乐，而是通往审美。晚明对欲望的重估包含着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在任情放诞的背后，是晚明文人的精神挣扎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欲望和审美之间，身体是中介。晚明小品文所展示的对身体感官经验的迷恋是对宋明理学道统的反叛，通过尊重人的自然本能，凸显人的生命价值，将“体舒神怡”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审美体验，将感性欲望作审美提升。曾婷婷对晚明小品文中记载的文人“癖好”

的美学讨论也很有新意。她指出：在西方，审美是智慧，是超越，而“癖”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投入与耽溺，在西方美学史上是没有地位与价值的，通常被视作生理或心理的“畸变”；即使其中包含审美成分，也是一种病态的审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癖”的宽容，是出于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与理解。而到了晚明，追求“癖”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竟成为风标时尚。这里面有社会政治和理学道德观念压抑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却是由晚明物质文化和都市生活的条件催生的新的“物—我”关系。“癖”之所以可以作为新的美学观念，指的正是物与我之间的关系。“癖”的主体是否发自天性，悟自本心，真正与物相投契、相感发，也是“癖”能否成为审美活动的重要指标。她写道：“晚明文人对物质世界的深入了解，不仅在于回到大量的文献中去搜寻前人对名物世界的观察与领悟，依‘细究物名’‘了解物性’‘辨明物用’等几个角度，建立起一个纸上认知的名物世界，还经由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实践，建立起独特的美感经验，以获得对物质世界细腻的辨知与领悟。”“‘癖’一方面反映出一种反抗社会世俗价值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显示一种以‘癖’来寄托、承载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透过‘癖’让生命超拔于世俗世界之上，以‘癖’来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进入新的人生境界。有所癖好者，对物的全情投入，正是离弃世俗世界，进入特殊生命理想境界的入口。”这样的阐释有深刻的见地，可以说在中国美学观念史研究方面是一个有示范意义的尝试。

晚明美学的当代意义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会呈现出表象上的类似性。从曾婷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美学注重经验鉴赏达到极为精致的程度，这和某种粗鄙化的世俗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日常生活美学，绝不等于审美经验的尚丑或粗鄙化，即便后现代西方美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宣告审美价值的终结，中国美学的深厚传统和人文底蕴仍将焕发她的魅力来继续滋养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其从物质功利主义和感官消费主义的洪流中带入审美绿洲，并终将改变其日常生活哲学。这大概是我阅读曾婷婷这部著作后对美的信念的唤起吧。

2017年5月20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序一 借鉴生活美学遗产，让生活更加精致、优雅

001 序二 晚明美学的中国韵致与当代意义

001 绪 论

033 第一章 “欲”：晚明日常生活美学观念展开之本原

034 第一节 “欲”观念在晚明的凸显

044 第二节 “欲”之审美性

051 第三节 “欲”与日常生活审美

063 第二章 “闲”：晚明文人日常生活样态

064 第一节 传统审美风尚史中的“闲”及其晚明特点

075 第二节 晚明文人的“闲赏”生活

090 第三节 “闲赏”之“趣”

103 第三章 “癖”：晚明日常生活美学样态之畸变

104 第一节 “癖”观念的成熟

112 第二节 “癖”的审美内涵

121 第三节 “癖”：审美的高度形式化

132 第四节 “癖”之内在审美动力机制

143 第四章 “奇”：从生活样态到美学精神

144 第一节 “奇”在晚明的凸显

155 第二节 “奇”与文人日常生活

172 第三节 “奇”的民间性

181 第五章 “生”：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之精神旨归

182 第一节 “生”美学观念在晚明的凸显

193 第二节 自我生命的养护

205 第三节 与自然物的和谐

216 结 语

230 参考文献

244 后 记

绪 论

